

马茂元 撰

马茂元

说

名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名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马茂元 撰

马茂元



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马茂元说唐诗

马茂元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51,000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25-2573-2

I·1308 定价:11.50 元

出版说明

这是继“蓬莱阁”丛书之后，本社推出的又一套设计新颖的学术精品丛书。

四十多年来，循着古代文化各领域研究的轨迹，我社不懈地以出版一流学术研究著作为宗旨，即使承担巨大的经济负荷也在所不惜，终于形成了以“中华学术丛书”为核心的上古社学术著作系列，并成为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比肩并峙的品牌图书而饮誉海内外，其价值绝不因年光流逝而减褪。常常地，我们接到各地读者的函电，询问这些精品图书有无再版的可能；也常常地，在书市上，我们见到有人淘拣到已经残损的一册半帙这类著作而喜悦不禁。于是，我们萌生了依据发展着的图书市场的需要，对我社这笔珍贵的累积以各种方式重版或重组的想法，这套丛书就是其中的一组。

考虑到当前青年学子的实际需要与承受能力，这套丛书择取影响尤著而为当今学术界读书界尤其急需的论题组合而成，或选自原来单行者，或节取文集之某一精粹部分，一书一题，说有专诣，人为名家，自成系列，故名之曰“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虽然，“名家说”的组合形式与“蓬莱阁”不同，然而在学术

源流上,却相承而又互补。如果说“蓬莱阁”着重收录清末民初以降国学宗师大家的开山之作,更多文化学术史的宏观建构;那末“名家说”,则多取三四十年代以来大师及名家们对某一专门领域或专题的潜心研究之作,更多由微观而见宏观,其所吸取的西学的成果,也随时代而有所不同。因此,即使二套丛书中作者有所重合,但品种的择取,仍以丛书各自的宗旨为别。于是由“蓬莱阁”而“名家说”,读者会产生由登堂而入室,探突而临佳境的感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则是文史哲打通,中西学兼融的世纪性学术趋尚,以及那包含着严格的学术规范的鲜明的学术个性。因此建议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应汲取具体的专门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其中所内含的思维形态与治学门径。

与“蓬莱阁”丛书相同,本丛书每一种前都冠以一流专家学者的导读性文字,相信同样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我心目中的马茂元先生 (代前言)

赵昌平

先生仙去了,虽因病笃而是意料中事,但临来总感到难以接受这一事实;虽已经月,但每晚握笔临楮,仍感到先生在为我指划口讲。《文学遗产》编辑部命我撰写有关先生的“学者研究”文字,自感确有许多想法,又颇难胜任。这不仅因为我无幸为先生的受业弟子,聆听系统的讲授;更因为古典文学学者有两类:一类每借助系统的理论构架来表现,较易形迹;另一类更多倾向于感知,以卓异的禀赋来感知文学的妙趣真谛,在对文本的切实研治中,逐渐显现文学史的轨迹,他们的文学史论,既不主要借助于现成的——无论是古的还是洋的——框架,而更多独特的心解,也就较难形迹。先生并不排斥理论,对任何新的事物,还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加以有机的汲取;但我总感到先生的主要学问倾向是属于后一类的。对于这样的学者,研究者如无研究对象那样的天分、识力、功夫、性情,就难以把握其精髓所在;而在这些方面,自己又何能及先生于万一!所以迟迟不敢动笔,深恐有负于先生在天之灵。

但是我确又真切地感到许多印象是如此的生动,感到先生作为前辈学者的许多素质、治学态度与方法,恰恰是我这样的中青年研究者所缺乏的;感到得其一端,即可受益一生。我应当把感到的这一切记录下来。所以这篇文章谈不到是系统的论析,而是更多断片的忆念;动笔之始,我甚至未曾周密计划,当结束于何处;只是任书桌玻璃板下先生含笑的遗容像他生前一般为我导引,随意带向何方。

一、强记与敏锐

奔来眼前的,首先是先生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力。1985年冬,先生上一次病情恶化,我闻讯赶往中山医院时,他昏迷已一昼夜,待到苏醒过来,先生疲乏地环顾周围的亲人学生们,说了句“隔世为人,好像出了趟远门”,接着眼角噙泪,背起了江淹《别赋》中的一节:“至如一去绝国,讵期相见。视乔木兮故里,决北梁兮永辞。左右兮魂动,亲宾兮泪滋。可班荆兮赠恨,唯尊酒兮叙悲。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虽然音声微弱,但竟然句读如常。大家又难受,又惊异,惊异于记诵似乎已化为先生的本能。如果问我先生学问的根底是什么,我想这种天赋的记忆力、广泛的记诵,应当是首要的一点。

先生的一位研究生曾对我说:“先生能背诵一万首诗,上课时,随口引诵,如泉之出山,听他的课真是一种艺术享受。”我虽未幸听到先生讲课,但常日随侍,论诗闲谈之间,先生也总是不假披检,随口引证,不仅有专攻的唐诗、汉诗、楚辞,且

广及宋元明清近代人诗与文赋,甚至诗话、笔记中的材料也常整段整段地背出来。先生有较浓重的桐城乡音,背到较冷僻的诗文时,不易听清,每当我稍现困惑之色时,他马上能发现,即时索来纸笔一句句写下,进一步讲解。一次我斗胆问先生是否真能背一万首唐诗,先生笑笑谦逊地说:“五千吧,五千吧。”接着便讲了他锻炼记诵能力的经过与趣事:

先生自小随其祖父、桐城文派后期大师马通伯先生习文,以记诵为第一层功夫。通伯先生手选前人诗集,以为家学,督责吟诵,由此予先生严格的磨炼。先生眼力不佳,到进入做学问的年岁,他人靠笔记、卡片录存的资料,他因书写吃力,就大都靠记忆,久而久之记忆力磨锐了,往往不有意识去背,仔细看过后也就记住了。我曾将自己习作的诗词向先生求教,凡律、绝,他听过或看过一遍即能脱离我的草稿,一句句讲评指正。于是不能不信服先生确有过目成诵的本领。

记得先生讲过两件趣事。一次赴京开会,在京友好五十多人的电话号码,他不用通讯录,都能记住,多次为忘带通讯录的友好提示。又一次,先生进了“学习班”,某日听领导讲话,过了一会管理人员将先生唤了出来,指责他竟敢无视领导,打瞌睡,抗拒改造。先生辨白自己确在听讲,对方不信,他就将报告一句句复述出来,管理人员目瞪口呆,只能悻悻地放过他。讲到这里先生笑道:“其实当时是在闭目养神,并不冤枉,只是不知不觉听到了,也就不知不觉记住了。想不到些些薄伎,竟能免我于一厄,呵呵!”从先生开心的笑声中,我却感到一种难言的酸楚。

与强记给我以同样深刻的印象的是,先生对诗歌艺术敏锐的感受力。我有幸拜识先生是晚至1982年夏研究生毕业

论文答辩之时,但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已为先生《楚辞选》、《古诗十九首探索》、《唐诗选》三书所倾倒,而时时在心中悬拟着先生的形象风采,因为“风采”是三书显而易见的共同特色。当时感到先生的注释不仅仅限于词语的诠释,而善于把握诗理,三言二语剔抉精美,由此而形成要言不繁的作者小传或题解,又汇为全书之序言,勾勒一代诗歌的发展脉络。也因此序、论多发前人之所未道。诗歌赏析,目前是搞得过滥了;但我相信,先生这种行家里手的赏析,其对诗歌美的独特的敏感,是他深渊学问的又一重要根底。不禁又想起一桩细事。约是1985年秋,我去长沙开会回来,先生问我有否新作。我将游岳麓山时所作二律念给先生听,当念到“半坡黄叶间红叶,一路松音伴足音”两句时,先生说:“停一下,你试把‘坡’字改作‘山’字,念念看怎么样。”我改读后,果然觉得响亮开阔得多,就问先生原因何在。先生说:“‘半坡’两字同声连用拗口,且坡字声音不亮,振不起,换山字,顺口,也亮得多。这样有助于上联的开阔景象,与下联的闲适意况能形成更鲜明的节奏变化。特别是你下联第二字用了个‘路’字,与‘坡’字韵腹相近,所谓平头,不免单调之感,改‘山’可避此病。你用‘坡’字,或许是你看到的景象是山的一侧坡面,但作诗要切而不泥。‘山’字从形象上更有纵深感,更启人想象。”先生于我何止是“一字师”,但这一字之改使我尤为惊叹,因为这不是在从容阅卷,细加推敲后所说的,而是我诵音未断,先生在瞬间所作出的反应,似乎对诗歌音义的敏锐感觉也已化为本能。《晚照楼论文集》中有一篇《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论杜甫和唐代的七言律诗》,在对杜甫律诗的触处生春般的分析中归纳出杜甫对唐人七律发展的巨大功绩。我想看了上述这桩轶

事后,必能更深地理解先生在此类论文中所表现出的深邃功力。

先生在诗歌研究中可说是得天独厚的。他的记忆力、艺术敏感性,对像我这样的普通研究者来说,是不可企及的;但是在先生的熏陶下,我日益感到,广泛的记诵与深切的体味,是诗歌研究中两项不可或缺的基本功,舍此,即使将理论讲得头头是道,也永远不能入门。可叹的是老一辈学者的这种素养功夫,在我们这一辈与下一辈中,已越来越薄弱了。

二、会通与识力

我印象中,先生讲得最多的两个词是“会通”与“识力”(有时说悟性)。他谈论最多的两位现代学者是陈寅恪先生与钱钟书先生。记得他常赞叹,陈先生做学问不依仗僻书,而总能在常见书中爬梳发掘出常人所忽略的资料,加以会通,形成超越时辈的创见,表现出惊人的识力。又记得1983、1984年,我去看望先生时,进门常见他手捧厚厚的《管锥篇》,贴近左眼,细细地阅读(因当时先生的目力更形衰退,右眼已看不很清铅印文字)。他常说:“《谈艺录》、《管锥篇》、《宋诗选》不可不读。淹通中外古今,旧学新学,识见超群。”先生论及的前辈同辈学者很多,而宗旨大抵在“会通”与“识见”之上,并常常自叹勿及。他常说:“读书做学问,如不能会通,则必拘墟不成气候;作书满架如无识力,不如真有真知灼见的论文一篇。”大概正基于这一看法,先生虽论著众多,但编入《晚照楼论文集》的,删汰仅存十八篇,约十九万言。我问先生为何如此严格。他感

叹地说,早年为家计所窘,形势所驱,作文务多,并不篇篇均好,何必兼收并蓄,耗费印工纸张和读者精力。十八篇自觉尚有一得之愚,后人能用到其中数篇,也就足慰平生。”又说“六十年代开始,境况好转,想更认真地做一点学问,轻易不作文,倒能作了许多准备,焉知十年浩劫,毁于一炬。”也因此先生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工作外人所知甚少。据我后来所知,先生这一时期在“会通”与“识见”上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孜孜矻矻,直至不起。

写成一部唐诗史是先生后二十年的最大愿望,事实上,在1964年前先生在“会通”与“识见”方面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唐诗虽是他主要精力所萃,但他的学问却是从头做起,前后左右开拓的。他自小随祖父习经史诗文,涉猎面极广。通伯先生治学,善于广集旧注所说后加以别裁,发为新解,这种方法对先生无疑有重大影响。先生著述甚富,《楚辞选》、《古诗十九首探索》、《唐诗选》外,他更是《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历代文论选》的数位主要撰稿人之一,对中国文学史、文论史的全貌有深入的了解。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晚照楼论文集》中各文大多具有纵横展开的特色。比如在《论骆宾王及其在四杰中的地位》、《论〈戏为六绝句〉》中可以见出他对六朝诗史的谙熟,及六朝至唐初文学演进的深入思考。而《从严羽的〈沧浪诗话〉到高棅的〈唐诗品汇〉》、《略说明七子的文学思想与李、何的论争》、《王世贞的〈艺苑卮言〉》、《〈董斋诗话〉中论自然景物的描写》这一组文章,则反映了他以唐诗研究为中心,对中国诗论的精深探索,有关四杰、杜甫、李商隐诸文中更可见出先生将其特有的艺术敏感性运用于作家乃至诗史研究中的成功努力;而《说〈通变〉》一文可以视作先生对于诗歌史、

诗论史的综合的理论思考。总之《晚照楼论文集》十八篇,从布局上看,以唐诗为中心,上起先秦,下迄清代,这本身就说明了先生是在如何的深度高度上进行唐诗研究的。因此要写唐诗史,如果不是以极高的标准自期,先生在浩劫到来前,就不难完成;浩劫之后虽然他身体衰弱了,但如果要写,也还来得及。1985年后,我见先生生病越来越频繁,一次比一次严重,深恐一旦不测,先生将赍恨终身,曾多次催促先生开笔写唐诗史,或者由我们几位助手学生协助先生来完成这一心愿。意思是那怕粗糙一点,也要让先生见到。但是,先生每次都不无悲凉之感地说:“薪尽火传,留待你们来完成它嘛。趁我还有些精力,再为你们铺铺路。”我们听了当然难受,先生又反过来风趣地安慰我们说:“我这是放一摊子嘛。年轻轻的怎么反不如我老叟通达。”先生所说的铺路,其实是对唐诗研究的从基础做起的进一步会通,是由作家考订、文本研究、诗歌理论三者结合的综合性工程,希望由此而为一部更科学的唐诗史作好充分准备。

两唐书《文苑传》与《唐才子传》的笺订是先生所作的第一项准备。浩劫前先生已完成了数十万字的书稿,及百余万言的资料札记,然而劫后硕果仅有的只是收入《晚照楼》集中两组共二十则文章,约三万余言。这个损失是对先生事业与身心的最沉重的打击。《唐诗史》最终未能开笔,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浩劫后先生曾一度想重新开始这项工作。后来见到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他欣喜地说:“这项工作有人作了,会比我做得更好。很好,很好。”也就作罢了。最近几年,傅先生主编约请国内学人所撰《唐才子传笺证》已出版了第二册,茂元师见到了第一册。傅先生最近来书说:“马先生未尽

其志，‘文革’中曾将《唐才子传笺证稿》付丙。前数年之所以约邀友人为校笺，亦有继承马先生未竟之业之意。”我想茂元师九泉有灵，亦当含笑。

先生的笺证从其遗作中不难看出，汇取了唐代诗文笔记中的大量资料，而加以会通，他尤重内证，善于从唐人诗文中勾取蛛丝马迹的资料，以纠史传之误；这在他的《楚辞选》中也有同样表现。他曾谦虚地说：“我的《楚辞选》比起专门家来功底其实相去太远；只有一点差可自慰，就是在以诗证诗上有一点发现。”先生对唐诗的谙熟理解与大量记诵，为其使用内证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沈佺期传》笺证，几乎全从沈诗中勾取行踪，即是一例。考中兼论是先生笺证的又一特色，往往随机而发，由事实引出评论，如初唐诸家考中论沈宋同异，陈子昂、四杰源流，杜审言杜甫之因革，均要言不繁，足启后人。这与先生之重视中小诗人的笺证，都表现出其考证的最终目的，是指向唐诗演进链索的，从而又使其避免了考订家常用的繁芜琐碎之病，表现出大处落墨，融会贯通的特点。记得一位友人曾说：“考订文章能写到马先生这样的畅达简明，文彩流丽，亦为一绝。”洵非过誉。

《唐诗选》的修订是先生所进行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先生选诗诚然有向一般读者普及之意，但根本的目的是在通过广泛的研读比较，精细的筛选别裁，把握乃至反映唐诗演进的脉络。一次我偶然翻阅先生架上的《全唐诗》，见不少诗上用红笔作了三种记号：○、○○、○○○，有的还加減圈数或改抹。原来先生在初选《唐诗选》时已二复《全唐诗》，修订中更反复沉潜揣摩，那些不同笔色的圈圈与改抹的地方显示了这一艰苦思考的轨迹。约在1984年我受先生委托，协助他对修订稿

作进一步审订,记得修订本《唐诗选》抽换增补篇目达原编的五分之一强,并对小传、注释作了严格的修订,除某些订误外,重点在于剔抉诗理,发挥诗歌的艺术美,有意识地显现诗史的前后联系。这部修订本与先生1984年与陈伯海先生合撰的《隋唐五代诗歌概述》一文,实已显示了先生心目中的《唐诗史》的基本轮廓。先生对选篇的审慎,我在协助他编撰《唐诗三百首新编》时有了更深体会。全书共三百三十一首,先生让我协助时已选定二百五、六十首。其余七、八十首,竟前后阅时两月余经十数次讨论方才选定,因为即使在这样一本小书中,先生也力图体现各体诗的主要发展轨迹,因而指导我将十余种主要唐诗选本的选目与选编思想作了新的排比探讨。他慧眼独具地指出孙洙《三百首》与其说胎脱于沈归愚《别裁》,无异说是宗祧王渔洋《古诗选》、《三昧集》,因而取径尤窄;从而定下了《新编》既要易诵易记,又要拓宽门径为初学者提供窥测唐诗发展概况之窗口的选编思想。选目中如取杜甫《彭衙行》以微见《咏怀五百字》、《北征》体格;以杜甫《秋兴》、《九日蓝田崔氏庄》分别与杜牧《早雁》、《九日齐山登高》对应,并通过评论挑明联系传承等等,均体现了先生选诗的全局思考与高屋建瓴的特色。由这本小书,更可推知先生于中型选本《唐诗选》中所贯注的艰苦劳动。《唐诗选》修订本稿件已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接受,相信不久的将来,先生这一精心结撰就可有以飨广大的敬慕者。

《唐诗研究资料精选荟萃》是先生为《唐诗史》所作的第三项大型准备工作。所以不用兼收并蓄的汇编,而用精选,即体现了以会通与识见对待资料的思想,企图在汇集前人评论的基础上,通过选编,对唐诗研究史作一全面回顾与梳理。为此

先生指导：①所编的体例分上下二编，上编为总论与分体论；下编为作家论流派论与各篇评述；②取材不局限于诗话笔记，而要广取历代诗文中的有关评述，尤其要重视唐代诗人中的直接评论，因为这种资料最能体现唐人本身的观念，是寻绎唐诗史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③取材要广，入选要精，希望在泛览群书的基础上，最后选取一百万字左右，从而显示唐诗各体的演进线索与各派各家的相互联系传承。此项浩繁的工作已主要由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的同志们大体完成，浙江教育出版社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出版此书，先生于泉下，亦必感激。

除以上三项工作外，先生对我谈起设想中的准备工作尚有唐代民情风俗资料汇编，唐诗研究史等等，可见计划中的《唐诗史》将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学术源流中展开，也可见先生虽久为病魔所困，但对新的研究方法仍然关注并有拣择地吸取。可惜这些工作未及展开，先生就远行了。

以会通与识见贯串的先生的诸项《唐诗史》准备工作，与前述强记与敏锐的学者素养互为表里，其实回答了多年来文学史研究中经常争论的一个方法问题：即研究应以资料为主，还是以观点视角为主；或说应以客观反映为主，还是主观解释为主。先生重识，重感受；他超卓的天赋，更使他的著作常发他人之所未道，给人以情采流溢，耳目一新之感；但是他的感受识见，决不满足于现成的视角、框架，也决不先验地为自己划定什么规律。强记与会通是他敏锐与识见的博大基础；他在脚踏实地的文本研究、资料汇集中，磨炼自己的艺术敏感性与辨识力，逐步积累，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又在更广泛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我体会在文学史研

究中主观为主还是客观为主的争论,在先生是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因为治史无疑要倾向解释,但解释必以对资料事实的详尽占有为基础。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应提倡新见卓识,这就是识力;而无根之谈再新,也只能是轻率,并无识见可言。广泛的记诵与充分的会通才使先生的解释总是这样灵动而富于个性。可以说先生的学问是对泥古不化与空疏无当两个极端的针砭。

三、通变与不囿

我努力回忆着先生治史中的理论体系,或者他曾讲过文学史演进的哪些具体而易把握的规律,以期使这篇文章能更加强理论色彩,稍符“研究”之名;然而这种努力不能不归于徒劳;在这片最为模糊的记忆中,只有“通变”与“不囿”二语最为清晰。这也许是因为我对先生精深的学问领会不深;但我更相信,这正是先生别具卓识的心解。

通变,如果说是一条规律,即也是一条涵盖面最广的规律,一条最为宽松而无现成模式可求的规律。可能正由于此,先生于《文心雕龙》五十篇中,单拈出《通变》一篇,作成《说〈通变〉》一文。此文鲜明地表现了先生以通变与识力为尚的治学态度。

《说〈通变〉》,将《通变》一文作为《文心雕龙》“文学历史观”(引文见本书《说〈通变〉》,下同)的集中表现来看待,因而先生会通了《文心雕龙》各主要篇章作综合的分析探讨,从而提出了几点极有启发性的思想。

首先先生将文学史看作是一个“文律”辩证发展的生动的“历史过程”。他论述道：“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其不变的实质而言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现象而言则为变。必须于通中求变，不变则穷。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着，推进着，没有尽头的。‘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就是这个意思。可‘日新其业’的千变万化中，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是‘文律’，因此又要变而不失其通，否则就会迷失了‘变’的方向，‘变’掉了它的实质，每‘变’而愈下了。‘通’与‘变’对举成文，是一个问题矛盾的两面；把‘通变’连缀成一个完整的词义，则是就其对立统一的关系而说的。”这里，先生反复强调了“文律”之通中有变，变中有通，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他的文学史研究是以文学本身的内在因素为主要对象。这在三四十年前文学史研究中机械唯物论常被研究者作为真正的唯物辩证法运用的年代里，就不仅足见学识，而且更具胆识。又由于先生对“文律”的研究，总是在“通变”的辩证过程中来考察，因而他对每一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总是具有一种生动的纵深感。比如在《论古诗十九首》（即《古诗十九首探索》序言）中精辟地分析了诗骚以降民间诗与文人诗，叙事成份与抒情成份的发展变化后，指出《十九首》承汉乐府叙事、抒情由揉杂趋向分流的演进态势，而以文人制作的固有特点，大力发展了“咏叹人生”，“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抒情短诗，从而直接启迪了建安文学高潮的到来。这一结论不仅与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以《十九首》为唯美主义而与汉乐府、建安诗相对立的观念针锋相对，而且将前人笼统提到的十九首为“风余”“诗母”（《诗境》）的合理见解丰富、充实起来，使这一节文学史演进的轨迹科学地凸现起来。对于《十九首》的这种分析，无疑是富于理论性